

# 啓明文稿選編

慶宏題



---

下冊

---

段启明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啓明文稿选编

慶宏題 

下册

段启明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目 录

*contents*

## (下 册)

### 第三部分 说 稗

试论《三国演义》历史观 ..... 475

——关于“英雄史观”和“正统观念”的辨析

论周瑜 ..... 485

——《三国演义》人物论

罗贯中与《三国演义》 ..... 496

忠义智勇的颂歌 ..... 507

——略说孔明与关羽

历史演义的典范 ..... 539

——浅谈《三国演义》的艺术

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 ..... 549

“渐变”的评说与“永恒”的形象 ..... 555

——谈《三国演义》中的“三绝”

|                          |     |
|--------------------------|-----|
| “政有三品”说与魏蜀吴的政权形态 .....   | 561 |
| 忠贞智慧的诸葛亮 .....           | 572 |
| 择主而事的三国谋臣 .....          | 583 |
| 《三国演义》是一部什么书? .....      | 592 |
| 试说吴宓先生论“三国” .....        | 610 |
| 中国古典戏曲小说人物形象系列美漫议 .....  | 621 |
| 漫谈古小说 .....              | 634 |
| 谈几部古典小说的序文 .....         | 638 |
| 《中国古典小说艺术鉴赏辞典》前言 .....   | 642 |
| 试说古代小说的概念与实绩 .....       | 647 |
|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新编·西游记》导读 ..... | 655 |
| 揭示文学“自身”的源与流 .....       | 659 |
| 刘鹗·老残·明湖居 .....          | 662 |
| 《水浒传》浅谈 .....            | 666 |
| “三端”相济 游刃有余 .....        | 670 |
| “逼上梁山”人物解析 .....         | 672 |
| 历史上的玄奘与《西游记》里的唐僧 .....   | 686 |
| 《金瓶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    | 701 |
| 文学的独创性原则 .....           | 715 |
| ——《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的思想和艺术     |     |
| 王渔洋的《题辞》与余秋室的佳《序》 .....  | 730 |
| ——谈《聊斋志异》的“独创性原则”        |     |
| 《全铸雪斋白话聊斋志异》序 .....      | 736 |
| 《古代小说公案文化研究》序 .....      | 740 |
| 《清代儿女英雄小说研究》序 .....      | 743 |
| 图文辉映的真正解读 .....          | 745 |
| 《说破兴亡多少事》序 .....         | 748 |

## 第四部分 国学胜语

|                   |     |
|-------------------|-----|
| 李贽的小说观 .....      | 753 |
| “嘉万三杰”与阳明心学 ..... | 761 |
| “水浒三序”与忠义之辨 ..... | 769 |
| ——重读李贽《忠义水浒传序》    |     |
| 国学胜谈六则 .....      | 779 |
| 经学与红学 .....       | 786 |
| 《兰亭序》与《红楼梦》 ..... | 788 |

## 第五部分 纪念散文

|                    |     |
|--------------------|-----|
| 报告文学：献给芬芳的沃土 ..... | 793 |
| 杂忆·琐谈 .....        | 805 |
| 读《吴宓日记》三题 .....    | 809 |
| ——纪念吴宓先生逝世三十周年     |     |
| 忆绪邦 .....          | 816 |
| 您心中只有学生 .....      | 819 |
| ——忆恩师郭预衡教授         |     |
| 忆健芬 .....          | 823 |
| 忆又辛师 .....         | 827 |
| 忆周老二三事 .....       | 834 |
| ——怀念周汝昌先生          |     |
| 胡同里的勺园 .....       | 840 |
| 编后记 .....          | 843 |

### 第三部分 | 说 稗



## 试论《三国演义》历史观

### ——关于“英雄史观”和“正统观念”的辨析

《三国演义》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它以自己特有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取得了在中国文学史特别是小说史上无可争议的重要地位，对于后世不断产生的历史演义小说（几乎可以沟通二十五史的一系列演义）来说，无疑具有开创性和典范性的意义，正好像司马迁《史记》之于后世纪传体正史一样。

《三国演义》是小说，是文学，因此，它首先是作者文艺观点、审美观点的体现，这是绝对不可忽视的前提。但是，由于它是一部历史小说，是通过对复杂纷繁的历史题材的处理来体现文艺观点审美观点的，因此，这中间势必熔铸了对历史的看法，从而表现了复杂的历史观。这样，在《三国演义》研究中，对于它的历史观的探讨，就成为无可回避的重要课题。

我们讲《三国演义》的历史观，自然是指其作者的历史观，但由于作者罗贯中除了《三国演义》外，还有很多作品，如果考察罗贯中的历史观，那就应该以他的全部作品作为基础和依据，但这已不是本文所能完成的任务了；另外，《三国演义》虽为罗氏编著，但它大量吸取了前人成果，而且在罗氏之后，又经清人毛宗岗的大力修订，所以现在撰写此文所依据的通行毛本，已不应看做仅仅是罗氏思想观点的反映，故而此处所讨论的历史观问题，乃就作品而论。

#### 一、“天下大势”与“英雄史观”

《三国演义》的历史观是极其复杂的，明人高儒说《三国演义》“据



正史，采小说”。这所谓正史，自然主要指陈寿《三国志》；而“采小说”，则主要是说采取了《三国志平话》之类。

关于三国故事的平话，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较早的本子是元代至治间新安虞氏刊印的《全相三国志平话》。这个平话的开头，是一个荒诞的转世投生的故事，即韩信转为曹操，彭越转为刘备，英布转为孙权，刘邦转为汉献帝，吕后转为伏后；曹刘孙三家分汉，乃是对刘邦杀戮韩信、彭越、英布的报复，这个故事显然是十分荒唐的。但它作为全本平话的开端，无疑具有囊括全书，确立格局的作用。尽管这个故事源于民间传说，但毕竟是落后的思想意识的反映；而平话以此为开端，确立全书的格局，恰恰体现了平话的因果报应论的历史观。

《三国演义》吸取了平话的很多内容乃至具体的情节安排，但是，对于这个宣扬因果报应的历史观的开端，却毫无保留地彻底地扬弃了，而代之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开宗明义，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把“天下大势”视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显然是《三国演义》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概括。这种概括正确与否，具有何种程度的合理性，姑且不论，应该看到的是，这里扬弃了因果报应论，肯定了历史发展本身具有客观的规律性，即从宗教迷信的传说，到富有哲理性的概括，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三国演义》的历史观，较之平话，有了长足的进步；而且，恰恰是这“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观，统罩全书，把全部人物情节都纳入这个格局，就是说，全书“陈叙百年，该括万事”，无比纷繁壮阔的历史画面，实际上都在历史发展分合之变的规律之中。

在《三国演义》的讨论中，很多论著都认为作品表现了明显的“英雄史观”，并予以批判。但是，如果我们充分考虑到作品开宗明义所提出的上述观点，那么，就“英雄史观”的问题，似乎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所谓“英雄史观”，其主要涵义应为“英雄”主宰历史发展，或者说，把历史发展的事实，看作个别“英雄”人物意志的表现。然而统观《三国演义》的全部描写，似乎并非如此。

在《三国演义》看来，由四百年的刘汉一统天下，一变而为群雄俱起，战乱百年，鼎足三分的局面，乃是“合久必分”的“大势”。《三国演义》所写的百年历史中，无数叱咤风云的英雄，都想据天下为一己所有，但事实上又都无法改变“合久必分”的必然规律。作品为我们塑造的曹操，无

论说他雄才大略还是狡诈奸雄，总之这一代英豪苦斗一生终于无法改变那“分”的“大势”。第七十八回写曹操临终之言曰：“孤纵横天下三十余年，群雄皆灭，止有江东孙权，西蜀刘备未曾剿除……”最后“长叹一声，泪如雨下。须臾，气绝而死”。这是一个戎马一生而并未成功的英雄的末日。刘备同样如此，作品不惜采取极其夸张的手法，表现他深得民心，而且身边还有诸葛亮那样的人物，但是，他也同样无法实现终生怀抱的恢复汉家一统的宿愿。临终托孤，对诸葛亮说：“朕本待与卿等同灭曹贼，共扶汉室；不幸中道而别……”（第八十五回），也是含恨而逝。刘备死后，诸葛亮励精图治，准备北伐，他在作品中几乎被塑造成一个完人，特别是为了表现他的“多智”，甚至不惜使之“近妖”（鲁迅语）。然而，六出祁山的结果，可以说并无进展，“北定中原”，“还于旧都”的目的，终未达到。第一百零四回对诸葛亮之死的描写，虽然渲染了一番“禳星”“祷寿”，似乎诸葛亮要对生死规律挑战，但亦终于失败。最后，“姜维入帐，直至孔明榻前问安。孔明曰：‘吾本欲竭忠尽力，恢复中原，重兴汉室；奈天意如此，吾旦夕将死’。”与刘备一样，都未能实现兴复汉室的宿愿，也就是由他们统一国家的宿愿，君臣二人临终都只落得徒然慨叹而已。总而言之，《三国演义》所着力塑造的一代英豪，都想按照自己的意志，改分裂局面为一统天下，建立自家的帝王统治，但结果一个个都壮志未酬，纷纷陨落。《三国演义》描写的历史并没有按照任何一个英雄的意志发展。

但是，《三国演义》在写诸葛亮死以后，却仅仅以十几回的文字，就把这样一个纷争百年的局面归于统一；而最终取得统一成果的司马氏父子以及钟会、邓艾等后起之秀，作为文学形象的光彩，又远远不能与曹操刘备诸葛亮一代英雄相比。由此可见，三分归一统，并非由于司马氏父子是超人的英雄！《三国演义》最后写道：“三国归于晋帝司马炎，为一统之基矣。此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者也。”显然，在《三国演义》看来，三分归一统，不是英雄的意志的体现，而是“分久必合”的规律使然。也许有人会这样说，《三国演义》描写的历史发展过程，之所以并非由英雄人物主宰，乃是因为受到三国历史本身的制约，而不是由分合之论的历史观所决定的。当然，《三国演义》作为历史小说，自然应该基本遵循史实；但问题在于，这正好说明，《三国演义》提出的分合之论，首先是对三国历史的解释，然后，才是据此确立小说的格局。因此，

史实的制约，与分合之论历史观所确立的小说的格局是完全统一的。

当然，《三国演义》以分合之论概括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本身无疑是一种极其表面的认识，是不符合历史科学的认识。《三国演义》对历史分合之变的解释是完全错误的：全书最后一首《古风》有云：“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正表现了以“天意”解释分合之变的唯心史观。总而言之，尽管“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观的本身并非科学的历史观，但是，它却帮助我们重新考虑、重新认识所谓《三国演义》宣扬反动的“英雄史观”的责难。

塑造英雄人物形象与“英雄史观”是绝对不容混淆的两回事儿。《三国演义》塑造了一大群英雄人物，有的是雄才大略，有的是才智超人，有的是武艺高强，有的是忠肝义胆，他们在一些具体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中，的确凭借着个人的能量，左右了局势的发展。但是我们决不能据此论断《三国演义》在宣扬英雄史观。

《三国演义》是文学名著，它所描写的主要人物，大多数都是以真实的历史人物为基础，经过艺术加工，而创造的文学形象。《三国演义》中那些最能突出人物英雄性格的情节，往往并非据史，而多属艺术虚构。例如关于赤壁之战，按正史陈寿《三国志》的记载，不过是说刘备“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或者是说“公（指曹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而《三国演义》却把它写成那么精彩生动的情节，藉以充分表现诸葛亮周瑜的英雄性格；著名的三顾茅庐，在《三国志》中的记载也不过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而《三国演义》中对“三顾”的铺陈，却精妙无比，突出了刘备诚恳谦逊、苦求贤能的品格，这种品格正是刘备深得民心，得“人和”之益，成一代豪杰的原因；至于作品所写关羽挂印封金、过五关斩六将、古城会斩蔡阳等等，更是正史所根本没有的，然而，无法否认的是，正是这些虚构的情节把关羽塑造为凭着一腔忠义而所向披靡的英雄。凡此种种，都说明《三国演义》以虚构的文学笔法为历史人物染上了英雄的色彩，于是这些人物也就主要是以文学的英雄形象流传于后世。

塑造文学的英雄形象，是各个历史时期各个阶级的文学的历史使命。《三国演义》作为封建社会描写统治阶级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的文学，而成功地塑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英雄形象，是不必多加指责的，正如资产阶级

文学，无产阶级文学也要塑造本阶级的英雄形象一样。尽管由于塑造的英雄形象的阶级属性不同，而使作品具有不可同日而语的价值，但是，决不能说塑造英雄形象就是宣扬英雄史观，这是显而易见的。

《三国演义》里塑造的人物形象，有些是过分的神奇，过分的“英雄”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但应明确的是，这里的“失”，乃是文学创作的失误，而不是为历史人物作传的失真；是审美观中的庸俗倾向，而不是历史观中的英雄史观。正因为如此，鲁迅先生这里强调的是“写人”而不是“传人”。

## 二、“尊刘抑曹”与“正统观念”

关于《三国演义》历史观的另一个问题，是“正统观念”。

封建社会是“家天下”的社会，只有由帝王一家子孙相传，世袭统治才算合法，才是正统；如果有别姓来取而代之，就不是正统。这种观念，往往又有“天命”论的外衣，因此具有极大的欺骗性。

《三国演义》有明显的正统观念，它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极力谴责曹操欲取代刘氏天下的野心，认为天下只应由刘氏世代统治，曹氏要取而代之，这就构成了封建社会中最大逆不道的“篡”；（二）由于刘备是“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具有刘氏帝王的一点依稀可续的血统，是所谓皇叔，因此，他称王称帝，就是合法的正统。这种陈腐的封建正统观念，显然是《三国演义》中的糟粕。但由此而来的一个问题是，作品中非常突出的、贯串始终的尊刘抑曹的倾向性，也就是对曹刘两个人物形象的贬斥与赞美，是否仅仅是正统观念的反映呢？

《三国演义》既然视刘备为正统，自然尊之；把曹操视为篡逆，自然抑之。但是，刘备曹操作为两个如此丰满的文学形象，显然不能仅仅看做是某种观念——即正统观念的表现。请试辩之。

两晋以来，哲学家、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们，对于三国的历史，特别是历史人物曹操，都发表过很多论述，这些论述的依据，自然是他们当时各自掌握的史料，与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无涉。他们对于曹操的历史评价，一般来说是既有推崇亦有贬斥，而推崇的成分居多。陈寿评价曹

操说：

太祖（指曹操）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sup>①</sup>

这是有代表性的推崇的评价。清人顾家相有一段饶有趣味的议论，他说：

唐人颂太宗者，有“神式同魏祖”之语。而杜子美《赠曹将军》诗，首句即云“将军魏武之子孙”，若在今日，施之于人，必怒詈不受，况敢以拟君上哉！……杜牧诗：“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盖谓周郎借东风之力，侥幸成功耳。<sup>②</sup>

这段议论虽出自清人，但所列事实，亦反映了唐代文人对曹操评价的基本倾向。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暗惑》篇中引述过《魏志》注引《语林》中的这样一段记载：匈奴遣使来朝，曹操命令崔琰冒充自己接见使者，而自己“握刀侍立”。接见后使人问使者“曹公何如？”使者回答说，“曹公美则美矣，而侍立者非人臣之相”。于是曹操使人追杀使者。刘知几对这段记载表示极大的怀疑，认为这样的事情“虽愚暗之主犹所不为，况英略之君，岂其若是？”但问题在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记载呢？刘知几的解释是，“曹公多诈，好立诡谋，流俗相欺，遂为此说”。刘知几毕竟是大史学家，他的见解是全面的，深刻的：既肯定曹操是“英略之君”，又指出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是“多诈”，“好立诡谋”。正因为有这样的特点，所以才“流俗相欺，遂为此说”。实际上刘知几这里已经指出了，流俗之说的曹操，集中表现的是曹操的多诈的性格特点，而不是对历史人物曹操的历史评价。宋人司马光、苏轼等对曹操也都作过既有推崇又有贬抑的评价。而南宋朱熹对曹操多有斥责，讲过曹操“无容于天地之间”，“人人得而诛之”的话；但这又与南宋的具体的历史条件有关。纪晓岚说：“（宋）高宗

① 《三国志·武帝纪》。

② 《中国小说史料》。

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纷纷起而帝蜀”。就是说，南宋人对曹操的贬斥，实为对金人入侵的抗议。明清时期，虽然贬抑曹操的三国故事在广泛流传，但依然有很多文人知识分子对曹操作出肯定的评价。明李卓吾在《焚书·读史》中有专论曹公二首，充分赞扬“曹公真可谓爱才之极矣！”清代曹雪芹的朋友爱新觉罗·敦诚在《寄怀曹雪芹》诗中有句云：“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曰魏武之子孙，君又无乃将军后，于今环堵蓬蒿屯。”把曹操作为他的好友曹雪芹的祖先。这样看来，顾家相所谓“若在今日，施之于人，必怒詈不受”的说法，亦未必尽然。凡此种种，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概念，即在三国以后的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很多文人学士，对历史人物的曹操，不仅并非一味斥责，相反，在很多方面倒是极为称赞的。由此可见，尊刘抑曹的倾向，绝非源于历代文人儒者对历史人物曹操的评价。

那么《三国演义》中如此强烈的尊刘抑曹倾向又是从何而来呢？又当如何解释呢？

很多讨论《三国演义》的文章、著作，都引用过苏轼的这条记载：

王彭尝云：“途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sup>①</sup>

这条记载确实是十分有价值的。它生动地说明，在宋代，包括儿童在内的广大群众在说话的影响下，已具有非常明确的尊刘抑曹倾向。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的曹操，不管他有多大的本领和才干，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多少胜利，但他首先是一个奸诈、残忍而又虚伪的人物，实际上这个流传中的曹操，已经成为封建统治阶级一切恶性的代表甚至是象征，因此，人民群众对这个曹操充满了憎恶和诅咒。而《三国演义》恰恰是在说话及其话本、平话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把人民群众的爱憎感情集中起来，加以艺术上的提高，使之更为强烈，于是就形成了《三国演义》中的尊刘抑曹。这里需要略加涉及的是如何看待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同毛本《三国志演义》

<sup>①</sup> 《东坡志林》，中华书局，1981年版。

之间的某些差异与尊刘抑曹问题的关系。

前文已曾申明，撰写此文所依据的原著，乃通行毛本。那么，尊刘抑曹的倾向，是否如有人所说，主要是毛本的问题，而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并非如此呢？

无论是现在可以看到的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还是经毛氏父子修订的《三国志演义》，作为文学作品，其某种思想倾向，都是通过完整的艺术形象而得以表现的。就尊刘抑曹的问题而论也是如此，或尊或抑，我们都应从曹、刘这两个形象的整体上来把握。在这两种版本的具体描述中，文字上的出入自然很多，对于曹操的描写，嘉靖本中的某些褒词，在毛本中没有了，但嘉靖本中的某些贬语，毛本也有所删。这是因为，毛氏的修订，并非仅仅着眼于加重对曹操的贬抑，而有着更广泛的目的。因此，仅据个别字句的增删，来判断某些思想倾向的有无，是不尽妥当的<sup>①</sup>。事实上，嘉靖本中的曹操形象，显然也是被鞭挞的对象，与毛氏修订后的曹操是一致的。明人蒋大器（号庸愚子）于弘治甲寅（1494）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撰写的序文中说：

曹瞒虽有远画，而志不在社稷，假忠欺世，卒为身阴。虽得之，必失之。万古奸贼，仅能逃其不杀而已，固不足论。

作品的序文自然是依据作品的内容而发，蒋氏的议论，充分说明嘉靖本中的曹操，已是一个所谓“万古奸贼”的形象。此外，嘉靖本保留的明张尚德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引》里也分明写道“曹操奸雄世无比，号令诸侯挟天子”。反映了嘉靖本中曹操的形象特征。

总而言之，嘉靖本和毛本的曹操形象，从整体上来说是一致的，因此，也就都存在着明显的尊刘抑曹的倾向。而这种倾向，正是唐宋以来人民群众爱憎的反映，也就是明人高儒所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据正史，采小说，征文辞，通好尚……”中“通好尚”三个字的涵义。这“通好尚”

<sup>①</sup> 对此问题，诸家看法不一。请参阅章培恒、马美信《三国志通俗演义·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刘敬圻《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曹操形象》（载《文学评论》1980年第2期）、李庆西《关于曹操形象的研究方法》（《文学评论》1980年第4期）等文章。本文基本上采纳李文的见解。



三个字，实在是不可忽视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适应了广大群众的希望和要求，表达了广大群众的爱和憎。一语道破了《三国演义》尊刘抑曹的基础和来源。

由于《三国演义》里的曹操，是一个具有强烈个性特征的封建统治阶级的艺术典型，因此，对于《三国演义》的广大读者来说，历史人物曹操在历史上的功过成败如何评价是一个次要的问题；而首要的，第一位的，是这样一个文学形象有着什么样的意义。我们看到的这个曹操，真实地概括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本性，因此抑曹或贬曹的倾向，实际上正是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控诉和鞭挞。《三国演义》的进步的思想意义，正在于此。而尤为可贵的是这种控诉和鞭挞，并没有把曹操简单地“坏人脸谱化”，而是在历史人物原型基础上深刻的典型化，使这一个曹操，既是历史真实人物，又是一个封建统治阶级的典型。

刘备是《三国演义》中的正面形象。这个形象在作品中的美学价值主要是作为曹操的“对比物”而存在的，就是说，从审美的意义上来看，他的作用主要是衬托和构成对比。

《三国演义》极力突出刘备的宽厚仁爱，这也同样是“通好尚”的结果，因为在黑暗的封建社会里，人民群众希望着、幻想着能够出现宽厚仁爱的统治者。毛泽东同志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里的“创造”，毫无疑问，首先是指物质生产。马克思、恩格斯说：“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sup>①</sup>在封建社会里，当人民群众还没有获得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学说的时候，也就是还不知道必须摧毁现存封建制度的时候，他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就需要一个能够进行正常生产活动的社会环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民幻想或希望有宽厚仁爱的统治者，是完全正常的历史现象。这既非调和阶级矛盾，亦非抹杀人民的反抗性。于是，人民群众在流传的三国故事中，就把这种希望和幻想寄托在刘备这一形象上。《三国演义》正是集中了人民群众的愿望，把刘备塑造成一个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引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5页。



宽厚仁爱的统治者典型，与曹操形成对比。

就个人的才智和集团所具有的实力基础而论，刘备都远逊曹操、孙权，但就因为刘备宽厚仁爱，深得民心，所以他终于取得足以同曹孙相抗衡的地位。孙刘在赤壁之战的胜利，形成三国鼎立。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在此之前，即第四十一回，作品以极为夸张的手法，描写了“刘玄德携民渡江”的情节，既表现了刘备“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的观点，也表现了群众对刘备的拥戴。有些论文批判这一情节是美化统治者，但如果我们把这一情节与赤壁之战的情节联系起来，把前者作为后者的背景，那就不难看出，赤壁之战的胜败，实则与民心的向背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总之，《三国演义》既描写了刘备宽厚仁爱的性格特征，也描写了人民群众对这样的统治者的拥戴支持。这正是《三国演义》塑造刘备这一典型的主观用意：人民希望有宽厚仁爱的统治者，人民支持宽厚仁爱的统治者。

然而，封建统治者的本性是反人民的，幻想和希望终究不能掩盖真实的生活，文艺作品，说到底毕竟是生活的反映。所以，在事实上三国时期或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中并不存在着刘备式的统治者的条件下，而塑造了这样一个宽厚仁爱的刘备，就难免不真实。正如鲁迅先生一针见血所指出的——“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

显然，刘备这一形象的意义，无论其真实性与深刻性，都无法与曹操典型相比。如前所述，曹操的典型意义，标志着《三国演义》的进步倾向，而刘备，确切地说，是作为曹操的对立面，烘托了曹操，衬托了曹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三国演义》如此强烈的尊刘抑曹的结果，乃是以操为主，以备为宾，宾主相映，表达了作品的思想意义。

总之，《三国演义》确实存在着正统观念，但其具体内容并不是尊刘抑曹；尊刘抑曹在作品中也是确实存在着的，但它是对历史上人民群众某种意志的集中，它不仅不是作品中的消极因素，相反，它恰恰标志着作品的进步倾向和积极意义。把正统观念与尊刘抑曹等同起来，笼统地加以批判，是不符合作品实际的。正统观念与英雄史观一样，都是我们在探讨《三国演义》历史观时所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原载《西南师院学报》1983年第1期）